

庚申外史箋证

任崇岳
著



庚申外史笺证

任崇岳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庚申外史笺证

任崇岳 著

责任编辑 卢海山

责任校对 温向苏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市新豫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123千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— 1000册

ISBN7-5348-0482-5/K·115 定价3.10元

目 录

前言	(1)
卷上	(7)
卷下	(81)
附录一	(158)
附录二	(159)
征引书目	(160)

前言

《庚申外史》又名《庚申帝史外闻见录》或《庚申大事记》，是一部记述元末明初历史的重要书籍，书中把元顺帝从1333年即位至1368年逃出大都期间的大事，都囊括无遗。因为顺帝生于元仁宗庚申年（1320），顺帝又是朱元璋给予的谥号，因而历史上叫作庚申帝。元朝定鼎中原，共历十帝，凡八十九年，顺帝一朝即占了三十六年，而这三十六年又是多事之秋，因此研究元末明初的历史，《庚申外史》是一部不可或缺的书。

《庚申外史》的作者权衡，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都没有为他立传，因而无从稽查他的身世，散见于其它记载的，也多是一鳞半瓜，语焉不详。权衡是江西吉安人，但是《吉安府志》和《吉安县志》对他的记载均甚疏略，仅说他是“隐德研学之士，著书甚富，有《庚申外史》二卷，专记元顺帝三十六年事。”就是这几句话，还是抄自明初人宋濂为《庚申外史》所写的跋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

由于文献缺乏，以致《庚申外史》钞本的收藏者，清人潘介祉竟误将权衡自号葛溪的“葛溪”二字与权衡讹为二人，《庚申外史》与《庚申大事记》也讹为二书。他在香传阁钞本的跋中说：

《庚申外史》上下二卷，乃元末朝野实录，钞本相传，颇多讹字，余稍以妄证之，惜无善册借为校讐，俾百无一误，以快目也。按作书者系明初葛禄与权，原本竟不记及。玩其

末简，亦似以朱祖誅戮太繁而微致警戒之意者焉。又，其时尚有太行黄华山隐士权衡，撰有《庚申大事记》，各载罕祿鲁氏生子沙漠之详，而不可得见。相传洪武初年，采风者曾上之于朝，然《元史·顺帝纪》中略弗一志，今收藏史籍之家，必尚有存是书者，怅无由得与《外史》汇而观之也。

近人臧励和等人编的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也因循致误，说权衡作《庚申帝大事记》，又著《庚申外史》，显然没有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。

介绍权衡生平较为详尽的，是宋濂为《庚申外史》所作的跋。他不但与权衡同时，而且还有过一面之缘，他说权衡“著书甚多”，当非凿空虚构。可惜的是，《元史·艺文志》、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、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，除了《庚申外史》一书外，其它著作均未提及，想是都已亡佚了，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。

宋濂与权衡邂逅的时间是“洪武辛亥”，即洪武四年，公元1371年。当时权衡已“年六十余”，我们姑且假定为六十五岁，那么，他的生年大约是元成宗大德十年，即1306年。至于他的卒年，因为没有蛛丝马迹可寻，不便蠡测，但他死于洪武年间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他历经成宗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、泰定帝、明宗、文宗、顺帝八朝，元朝的治乱兴衰，都是他亲身所历。可能是因为他学富才赡而名噪一时的缘故，连胸无点墨的赵赵武夫太不花、察罕帖木儿都要辟他为幕僚。太不花于顺帝至正十八年曾任中书右丞相，但他在至正十四年曾任过河南行省左丞相；察罕帖木儿也于至正十二年起兵沈丘，旋授汝宁府达鲁花赤。这时，权衡已隐居于彰德黄华山，因此，太不花、察罕帖木儿都想把他罗致幕下。也许是他不屑与这些武夫为伍，也许是看到了元朝的覆亡已

成定局，因此没有出山。二十八年的隐居生活使他可以冷静地观察时事，把他的所见所闻书诸毫端，《庚申外史》也就成书于这个时期。至于他在明朝建国后，为什么没有返回故里而到了江苏，又在什么时候寓居临江，现在仍然弄不清楚。

《庚申外史》的成就，是有目共睹的，这里我们打算分三点来谈。

- ✓ 首先，它为纂修《元史》提供了素材。《庚申外史》虽是私人著述，但以记事翔实而为人称道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：“所记皆元顺帝即位以后二十八年治乱大纲……所言多与元史相合，于宫庭搆煽、盗贼纵横事，皆能剖析原委。”^①正因为如此，“洪武初，诏修《元史》，采访顺帝遗事，其书曾上史馆。”^②我们知道，《元史》曾经两次纂修，第一次在洪武二年（1399），共成159卷。但因“顺帝三十六年之事，旧乏实录，史臣无所于考，阙略不备，于是，礼部尚书崔亮、主事黄甫与濂等发凡举例，遣使者十有一人，遍行天下，凡涉史事者，悉上史官……其不系公牒者，若乘舆巡幸，宫中隐讳、时政善恶、民俗歌谣以至忠孝贼乱灾祥之属，或见之野史，或登之碑碣，或载群儒家集，莫不悉心諮访。”^③《庚申外史》就是在这时被搜罗到史馆去的。1370年再开史局，续修《元史》时，无疑是参考了《庚申外史》的，这在顺帝本纪和有些列传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因袭的痕迹。在柯绍忞的《新元史》中，几乎一字不遗地把《庚申外史》抄入了有关本纪和列传。毕沅的《续资治通鉴》、屠寄的《蒙兀儿史记》，也有抄自《庚申外史》的痕迹。它的影响之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- ✓ 第二，作者在著述中持有比较正直的态度。本来，每一部史书都不能不体现作者的爱憎褒贬，纯客观的叙述是没有的。历代

关于元末农民起义的记载，可谓汗牛充栋，卷帙浩繁，但大抵都免不了盗贼二字，而在《庚申外史》中，却有比较公允的评价。比如在谈到彭莹玉时说：“及事败，逃淮西，淮民闻其风，以故争庇之，卒不为有司所获。”寥寥数语，彭莹玉与老百姓关系之密切，他受到的拥护与爱戴，便跃然纸上。谈到至正十一年的红巾军大起义时说：“刑赏失措，又兴挑河工役，所在肆虐，又并省衙门，沙汰吏胥，无所容迹，五月，颍川颍上红军起，号为香军。”指出了红巾军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结果。谈到芝麻李时说：

“芝麻李者，邳州人也，值岁饥，其家惟有芝麻一仓，尽以赈人，故得此名。”这就告诉人们，芝麻李是一个急难好义、赈贫济穷的英雄。这种洋溢于字里行间的赞许，可谓独具只眼。正因为如此，权衡受到了封建文人的攻讦和抨击。清人李慈铭云：“阅权衡《庚申外史》、文笔俚拙，其称韩林儿为小明王，刘福通为刘太保，盖以明祖初奉林儿之故。至称明玉珍为明元帅，而亦不名，则不知何故矣……又于察罕、脱脱父子，多加贬辞，以及田丰之杀察罕为义，弥乖正论。”^④其实，李慈铭所攻讦的正是《庚申外史》的长处。所谓“文笔俚拙”，自然要比佶屈聱牙、艰涩生硬的文字好读；称义军领袖的官衔而不直呼其名，对元朝倚为干城的察罕帖木儿父子、脱脱父子多加贬辞，则体现了权衡不同于流俗的远见卓识，是应该充分肯定的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们也看到了权衡对元朝统治者的不满和抨击。如在谈到右丞相脱脱把有关河南农民起义的奏牍改题为“河南汉人谋反事”时，加了一句评论：“识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，河南人可尽诛乎？”指出脱脱所干的，不过是为丛驱雀、为渊驱鱼的蠢事。在谈到河南南阳等地因有“上马贼”劫富济贫，元朝统治者特设天下兵马分司弹压时，评论说：“不究其本，而

徒事其末，终亦不能禁也。”指出元朝统治者不改弦更辙而一味镇压，是舍本逐末，不会收到效果的。

✓ 第三，在《庚申外史》里，有许多不见于他书的记载，这就为我们研究元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。比如重纪至元四年（1338）河南范孟的起义，至正十一年芝麻李、彭大、赵君用的起义，《庚申外史》比其它史籍更为详尽，脱脱之父亦官亦商、脱脱改奏牍为“河南汉人谋反事”、危素为权臣草诏等，亦皆为他书所不载。权衡是元朝由盛而衰的见证人，他的记载也就比较可靠。

自然，《庚申外史》也有它的不足之处。权衡因过了二十八年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，而使他的著作有失真之处。由于他僻居山坳，囿于见闻，因此，要求他的记述与事实锱铢悉合，事实上做不到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时间舛误，二是事件考核不精。比如：顺帝即位于权臣燕帖木儿死后，《外史》却说成是他生前；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三史之修，在右丞相脱脱的主持下，克服了重重困难和阻力，有筚路蓝缕之功，《外史》却说他从中作梗；赵王系汪古部而非孛儿只斤氏，不可能觊觎帝位，《外史》却说老的沙等曾扶赵王阴谋篡位；顺帝以疾殁于应昌，《外史》却说他携后妃遁入和林，等等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，是《庚申外史》中关于庚申帝是宋恭帝赵显之子的记述，曾在史学界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，这场争论持续了五六百年之久。钱谦益、万斯同、全祖望、赵翼、王国维等人或撰专文，或为疏证，认为此说不诬。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认为，“核以事实，渺无可据，实为荒诞之尤，非信史也。”余嘉锡也说：“然则谓妥懽帖睦尔非明宗子之诏，不过据一时之流言以诬之……故庚申帝是否为宋恭帝之遗胤，当别求其它证据，而不可以文宗之诏为定案、亦已明矣。然而权衡之史、余应之诗，

不过纪其所传闻，故余于庚申帝为瀛国公子之说，虽颇信之，而苦于不得确证。”^⑤近来有同志写《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》，以大量证据批驳了所谓庚申帝为恭帝之子说的谬误。看来事出有因，却查无实据，庚申帝是明宗子，现在已是很清楚的了。

尽管如此，《庚申外史》仍然是瑕不掩瑜之作。明初纂修《元史》时，聚集了那么多人力物力，仍不免有扞格牴牾之处，权衡以一人之力，在山沟里撰写元朝近四十年的历史，有点纰漏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

《庚申外史》经过长期流传，版本甚多，仅笔者所见就有《宝颜堂秘籍》本、《学津讨原》本、《学海类编》本、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、《豫章丛书》本以及钞本、各种翻印本等。《宝颜堂秘籍》本流传最早，但错误严重，《学津讨原》本错误较少，但脱漏太多，都不是理想的底本。[✓]《豫章丛书》本经过校勘，错误较少，大致接近原貌，我们就以它为底本，校以《学津讨原》本。凡删去的字，均用圆括号表示，补的字，均用方括号表示。在笺证中尽量征引最早的记载，晚出之书，只引其考订而不征引史实，特在这里说明。

末了还要说明的是，这本小书是在我的老师翁独健教授、贾敬颜教授指导下写成的，从确定版本、搜集资料到笺证内容，都经过翁先生、贾先生的悉心指正。昊天不吊，不慈遗一老，如今翁、贾二先生均已作古，谨以这本小书作为对先生的悼念！

注：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52：《史部·杂史存目·庚申外史》）。

②张海鹏作《庚申外史》跋，是《学津讨原》本。

③《宋学士文集》卷14：《吕氏采史目录序》。

④《越缦堂读书记》上册第397页，中华书局1963年版。

⑤《四库提要辩证》卷5。

卷 上

癸酉 元统元年。

即1333年，顺帝于是年即位

先是，岁壬申秋，文宗车驾在上都。

《元史》卷36《文宗本纪五》：“〔至顺三年（1332年，即壬申年）〕五月……庚寅，大驾发大都。”按，元朝诸帝为避大都酷热，例于每年四至八月驻蹕上都。《草木子》卷3《杂制篇》云：“元世祖……每年四月，迤北草青，则驾幸上都以避暑，颁赐于其宗戚，马亦就水草。八月草将枯，则驾回大都，自后宫里岁以为常。”

八月，疾太渐。

《元史》卷36《文宗本纪五》：“八月……己酉……帝崩，寿二十有九，在位五年。”

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，大臣燕帖木儿曰：“昔者晃忽叉之事，为朕平生大错，朕尝中夜思之，悔之无及。”

《元史》卷31《明宗本纪一》：“八月乙酉朔，次王忽察都（即外史之晃忽叉）之地。丙戌，皇太子入见。是日，宴皇太子及诸王、大臣于行殿。庚寅，帝暴崩，年三十。”

《南村辍耕录》卷1《列祖授受正统》条云：“八月二日，（明宗）大驾次王忽察都，六日，暴崩。”《元史续编》卷10胡粹中云：“闻之故老言：燕帖木儿奉上玺绶时，

明宗从官有不为之礼者，燕帖木儿且怒且惧，即而，帝暴崩。燕帖木儿闻哭声，即奔入帐中，取宝玺，扶文宗上马南驰。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尽哀，燕帖木儿以皇后命奉皇帝玺绶于太子，其说不合，岂当时忌讳，有不敢明言者欤？”

《元史》卷36《文宗本纪五》云：“后至元六年六月，以帝谋为不轨，使明宗饮恨而崩，诏除其庙主。”《二十二史札记》卷29《元史回护处》条径云：“明宗崩，此固文宗及雅克特穆尔（即燕帖木儿）之弑逆也。”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8《北伐中原》条则说明宗系饮鸩而崩：“元之臣子，不遵祖训……泰定以臣弑鸩君，天历（即文宗）以弟鸩兄……”此说出自朱元璋之《北伐檄文》，当非向壁虚构。

燕帖古思虽为朕子，朕固爱之，然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。汝辈如爱朕，愿召明宗子妥懽帖木儿来登兹大位，如是，朕虽见明宗于地下，亦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！”言訖而崩。

《元史》卷38《顺帝本纪一》：“（文宗）寻至大渐，顾命有曰：朕之大位，其以朕兄子继之。”同卷又云：“〔至顺〕三年八月己酉，文宗崩，燕铁木儿请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，后不从，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，是为宁宗。”同书卷37《宁宗本纪》亦云：“〔文宗〕圣体弥留，益推固让之初志，以宗社之重，属诸大兄忽都笃皇帝之世嫡。乃遣使召诸王宗亲，以十月一日来会于大都，与宗王、大臣同奉遗诏。”据此，则文宗弥留之际，仅云传位于明宗之子，未言传位于妥懽帖木儿。同书卷38顺帝在诛杀唐其势党羽诏书中云：“曩者文宗皇帝以燕铁木儿尝有劳伐，父子兄弟，显列朝廷，而辄造事衅，出朕远方，文皇寻悟其妄，有旨传次于予。”此言殆未可信。《新元史》卷23《惠宗本纪》云：“文

宗崩，遗命传位于帝，燕铁木儿矫诏立宁宗。”显系抄袭权衡之说，亦不足据。

晃忽叉者，乃明宗皇帝从北方来饮毒而崩之地。

据《元史》卷31《明宗本纪》载，他于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一月即位于和宁之北，旋即应其弟文宗之请，从漠北南下，于八月乙酉到达王忽察都，四天后被文宗鸩死。

燕帖木儿大惧，为之躊躇者累日。自念晃忽叉之事，已实造谋，恐妥懽帖木儿至，究治其罪。

《元史》卷138《燕铁木儿传》：“明宗之崩，实与逆谋，恐其（指妥懽帖木儿）即位之后追举前事，故宿留数月，而心志日以奢乱。”

姑秘文宗遗诏，屏而不发。因谓文宗后曰：“阿婆且权守上位，安王室，妥帖木儿居南徼荒瘴之地，未知有无，我与宗戚诸王，徐议之可也。”

按：文宗崩后，妥懽帖木儿之弟懿璘质班继立，是为宁宗，宁宗死后方始议及妥懽帖木儿，前已笺证。

是时，燕帖木儿以太平王为右相，礼绝百寮，威临赫赫，宗戚诸王无敢以为言者。

燕铁木儿于天历元年（1328）被文宗封为太平王、中书右丞相。据《元史》卷138《燕铁木儿传》云，文宗为酬其拥戴之功，下诏“凡号令、刑名、选法、钱粮、造作，一切中书政务，悉听总裁。诸王、公主、驸马、近侍人员，大小诸衙门官员人等，敢有隔越闻奏，以违制论……燕铁木儿自秉大权以来，挟震主之威，肆意无忌。”

迨至至顺四年三月，上位虚摄已久，内外颇以为言，燕帖木儿始迎明宗皇帝次子懿璘质班登宝位。

此处所说时间不确，《元史》卷37《宁宗本纪》云：“〔至顺三年〕十月庚子，帝即位于大明殿，大赦天下。”《南村辍耕录》卷1《列圣授受正统》条亦云：“至顺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，即位于大明殿，”

不发诏，不改年号，逾月而崩，庙号宁宗。

《蒙兀儿史记》卷15《图帖木儿可汗本纪》云：“不录诏书，不书告祭郊庙社稷，以未成君，故削之。”又云：“在位五十有三日。”而《元史》卷138《燕铁木儿传》则云：

“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，四十三日而崩。”《南村辍耕录》亦有同样记载，均误。按，宁宗即位于十月庚子，庚子为初四日，崩于十一月壬辰，壬辰为二十六日，当为五十三日。

继而燕帖木儿建议欲立燕帖古思，文宗后苦辞曰：“天位至重，吾儿恐年小，岂不遭折死耶？妥懽帖木儿在广西静江，可取他来为帝。且先帝临崩云云，言犹在耳。”于是，燕帖木儿知事不能已，遂奉太后诏旨，遣使去广取妥懽帖木儿太子来京。

《元史》卷38《顺帝本纪一》：“宁宗崩，燕帖木儿复请立燕帖古思。文宗后曰：‘吾子尚幼，妥懽帖睦尔在广西，今年十三矣，且明宗之长子，礼当立之。’乃命中书右丞闾里吉斯迎帝于静江。”

太子行至良乡，以郊祀鹵簿礼迎之，盖燕帖木儿欲以此取悦太子之意。既而燕帖木儿驱马与太子并行，马上举鞭指示，告太子以国家多难，遣使奉行之由，太子讫无一言以答之。

《元史》卷138《燕铁木儿传》：“〔妥懽帖木儿〕至良乡，具鹵簿迎之。燕铁木儿与之并马而行，于马上举鞭指画，告以国家多难，遣使奉行之故，而妥懽帖睦尔卒无一语以酬之。”燕帖木儿心疑惧，留连至六月，方始使登位，改元元统元年。

《元史》卷38《顺帝本纪一》：“燕铁木儿心疑之，故帝至京师，久不得立。适太史亦言帝不可立，立则天下乱，以故议未决。迁延者数月，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，奏文宗后而行之……至顺四年（1333）六月初八日，即皇帝位于上都。”是年十月，始改元为元统元年。

尊文宗后为皇太后。

文宗皇后在宁宗时即已被尊为皇太后，非在顺帝时。《元史》卷37《宁宗本纪》云：“〔至顺三年（1332年）〕十一月……戊寅，奉玉册、玉宝尊皇后曰皇太后。皇太后御兴圣殿受朝贺。”

丞相燕帖木儿加太师、左丞相，撒敦为右丞相。

此二人官职皆不确。据《元史》有关本纪、列传、三公表、宰相年表，燕铁木儿于天历元年受封为太师，未任过左丞相，撒敦于元统元年任左丞相，后至元元年死去，亦未任过右丞相。

伯颜为枢密院知院。

《元史》卷138《伯颜传》：“〔天历三年〕正月，拜知枢密院事。”非元统元年。

唐其势为御史大夫。撒敦者，燕太师之弟也；唐其势者，燕太师之子也。

《元史》卷138《燕铁木儿传》：“妥懽帖睦尔始即位，是为顺帝。乃以撒敦为左丞相，唐其势为御史大夫。”撒敦为燕铁木儿之弟，唐其势为其子。

徵政院使，宦者高丽人秃满歹儿者，首荐高丽女子祁氏于帝。祁氏性黠慧，有宠于帝。

《元史》卷114《后妃传》：“宪宗忽都皇后奇氏，高丽人……初，徵政院使秃满歹儿进为官女，主供茗饮，以事顺

帝。后性颖黠，日见宠幸。”

秋九月，太后谓大臣曰：“正宫未有人，何不选立之？”众对曰：“今太师丞相有女，端严正大，宜为天下母。”于是，立太师女伯牙吾氏为后。

《元史》卷38《顺帝本纪一》：“〔至顺四年〕八月壬申……立燕铁木儿女伯牙吾氏为后。”同书卷114《后妃传》亦云：“顺帝答纳失里皇后，钦察氏，太师太平王燕铁木儿之女。至顺四年，立为后。”但同书卷138《燕铁木儿传》则云：“至元元年三月，立燕铁木儿女伯牙吾氏为皇后。”《新元史》卷23《惠宗本纪》亦系其事于至顺四年，至元元年说误》。

后，权臣家女，习于骄贵，又轻帝年幼，见帝宠祁氏，心不平之，日夜捶楚祁氏，几不胜。一夕，又跪祁氏于前，筹问其罪，加烙其体。翼日，司天奏：“昨夕火星犯后妃。”帝虽不言，甚衔之。

《元史》卷114《后妃传》：“答纳失里皇后方骄妒，数羞辱之。”其时祁氏尚未被立为第二皇后。

初，世祖皇帝家法，贱高丽女子，不以入宫。至是，始坏祖宗家法，识者知天下之将乱也。

《元史》卷41《顺帝本纪四》：“监察御史李泌言：‘世祖誓不与高丽共事，陛下践世祖之位，何忍忘世祖之言，乃以高丽奇氏亦位皇后。’今灾异屡起，河决地震，盗贼滋蔓，皆阴盛阳微之象，乞仍降为妃，庶几三辰莫位，灾异可息。”不

听。”据此，则世祖时高丽女子不得为后，并不禁止入宫。《二十二史札记》卷30《元时选秀女之制》条云：“元时并有选高丽女之例，文宗以官中高丽女不颜帖你赐丞相雅克特穆

尔（旧名燕铁木儿）……”即是一例。

甲戌 元统二年（1334），太师，太平王燕铁木儿自帝即位以来，不复留心政事。

此说不惬。《元史》卷138《燕铁木儿传》云：“燕铁木儿既死，妥懽帖睦尔始即位。”同书卷38《顺帝本纪一》亦云：

“俄而燕铁木儿死，〔文宗〕后乃与大臣定议立帝。”可证燕铁木儿死于顺帝即位之前。

惟日溺于酒色，收晋邸后为妻。诸公主嫁之者四十余人。有某王位公主，嫁及门三日，不得见，既而传旨曰：“公主且归，我要时来取。燕帖木儿宴赵中丞家，男女共坐，名为鸳鸯筵席。隅座中有一妇人，颜色甚丽，太师目之，问曰：“此为谁？”意欲留之。左右告曰：“此太师几夫人某氏也。”由是酒色过度，体羸溺血而死。

《元史》卷138《燕铁木儿传》：“一宴或宰十三马，取秦定帝后为夫人，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，或有交礼三日遽遣归者，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。一日宴赵世延家，男女列坐，名鸳鸯会。见座隅一妇色甚丽，问曰：‘此为谁？’意欲与俱归。左右曰：‘此太师家人也。’至是荒淫日甚，体羸溺血而薨。”

太尉伯颜升为右丞相。

此说不确。伯颜于至顺四年六月受封为右丞相，其时尚未改元。《元史》卷138《伯颜传》云：“〔至顺四年〕六月，顺帝至自南服，入践大位，嘉伯颜拥戴之功，拜中书右丞相、上柱国、监修国史。”同书卷38《顺帝本纪一》，卷113《宰相年表二》同。

当帝在广西来京师，宿留汴梁，心方不测朝廷权臣意，其时伯颜